

新的土壤

王西彦



新 的 土 壤

王 西 彥 著

新 文 艺 出 版 社

• 1958 •

新的土壤

王西彦 著

*

新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陕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销

*

书号 1771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 5/8 字数 122,000

1958年8月第1版

195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7,000 定价(6) 0.55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作者的近作集,里面包括四个中、短篇小说,都是以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斗争为题材的。中篇小说《艰辛的日子》,描写历史学教授白嘎天自我改造的艰辛历程。短篇小说《新的土壤》,通过地理学教授严仲良和他养女的遭遇,歌颂了新社会。短篇小说《风暴》,是反映大学里的反右派斗争的,作品里塑造了一个正直的老教授左爽的形象,同时也刻画出右派分子李含章的丑恶嘴脸。另一个短篇小说《哥哥下乡去了》,描写儿子下乡参加劳动锻炼,对父母思想上所起的作用,反映了年青一代的行动,怎样有力地推动了老一代的知识分子。

目 次

艰辛的日子.....	1
新的土壤.....	85
风暴.....	117
哥哥下乡去了.....	173
后记.....	200

艰辛的日子

一

昨晚家瑋沒有回家，自然是到他的光明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去了。他去的时候，已經下午三点多鐘，是上完兩节課后才动身的。不管心里有多么不贊同，但我並沒有在口头上当面阻止他；而且，他也根本沒有向我好好告辞——他已經习以为常了。自然，最重要的，他認為自己做着一件天經地义似的事情，他是理直气壯的，我这做父亲的人反正不能有什么不同的意見。今天早晨他回家来时，時間还很早，我正在門前充滿阳光的小园子里做早操——这是我新近养成的习惯，开始得还不太久。大約半年以前，为了照顧我的研究工作，学校里換給我这一幢比較寬敞的新住宅，使我不仅有了自己一間舒适的小書房，还有了門前一个小园子。我就听从医生的劝告，利用这个小园子和几百步外运动場里的广播，作起这近二十年来沒有作过的早操，活动活动自己已經上锈的筋骨。不过，因为昨晚的睡眠不够好，这会头腦有些沉重，腰背也有些发酸。我剛剛朝前面弯下半僵硬的上身，就听見家瑋从边門走进屋子的脚步声。我

站直身子，回过头来，正好看见他那张给初冬的晨风吹得通红的脸孔。

“昨晚就在农业社里过夜的嗎？”我問道，竭力掩飾自己的不滿情緒。

“爸爸，我們社里的棉花快收好啦，遭了风灾，可还收到一百五十斤！”他眨眨一双稔气的兴奋的眼睛，急口說着，仿佛要用这些話来赢取我的好感，“双季稻的收成也不坏，也超过了去年的單季稻；蔬菜又是丰收。估計起来，一个劳动日，可以分到一块多錢，保証全社社員百分之九十增加收入，沒有問題……”

“好，你們社里！”我半玩笑地切断他的話，对他揮揮手，“現在，快上楼休息去吧，肚子餓了嗎？”

“不餓，爸爸。”

“好，休息去吧，不餓也休息去！你看你那身衣服！”

大概从我这显得有些严峻的帶有責备意味的声音里，听出一种父性的关切了，家瑋連忙低下头，轉过身子，跑上楼去——看样子，虽然衣服上的泥污已經不能掩飾，他可还避免使我发现他那双缺乏睡眠的发紅的眼睛。

我的早操不能不中断了。我跑到厨房里去，吩咐吳媽給家瑋准备吃的，接着又跑上楼去。我听见从臥室里傳出安尼的咳嗽声。論年紀，安尼正当壯年，可是身体不好，有着未老先衰的象征，一直犯着纏綿的失眠症，整晚睡不上三四小时，如果在平日，早晨起身照例是很迟的；加上昨晚因儿子沒有回家，快到夜半了，她这作母亲的人，还跑到学校

的边門口去探望，最后回来时，上床很久还在轉側翻身。这会，也許正是她酣睡的好时刻。家瑋把脚步放得輕輕的，想一下子就閃过母亲臥室的門口，回到后面自己的小屋子里去。可是，白費心机，他剛剛挨近母亲的房門口，就看到她蓬头散发地从房子里闖出来了。

“咳！你怎么通晚都沒有回来呀？”她慌張得簡直想要把儿子抱在自己怀里，連眼睛也立刻变潮潤了，“你就在农业社里給他們幫了个通宵呀？为什么連晚上也要留在他們那里呢？”

“晚上只給夜中学上了兩节課。”

“为什么不赶回家来？不是晚上九点也还有公共汽車嗎？”

“公共汽車沒有赶上，他們叫我就睡在社里好啦，我想，反正時間已經晚啦……”

作母亲的人的关心却在另一方面：

“只上兩节課！你看你，連眼睛也熬紅啦！还不赶快休息去！这孩子，簡直发了瘋啦，連自己的身体也不顧啦！”

于是，她就半強迫地把他推到他的小房子里去。她一边嘮嘮叨叨地詢問着“有沒有受涼”和“睡得好不好”之類的話，一边就幫着他脫掉皮鞋、袜子、長褲，又給他盖好棉被，把被边塞得严严实实的，仿佛在这一刻，他重新变成了一个沒有能力照料自己的小孩子。接着，她又轉身匆匆忙忙地跑下楼去，把楼梯踩得通通发响——不用說，她是給儿子張罗吃的去了，她一定認為儿子不仅已經累坏了，而且也餓坏

了。在这样的時候，她自然不肯放棄自己做母親的權利的，即使我告訴她已經吩咐過吳媽也沒有用，也攔阻不住她。

看到安尼這副蹣跚奔跑的樣子，在我心胸里，突然湧起一股分不清是同情還是憐憫的情緒。而且，這種情緒也仿佛是對我自己，我覺得自己的確已經衰老了，身心兩方面都衰老了。我不知道當家瑋決定留宿在農業社里時，有沒有想到父母焦灼的等待和深重的懸念，如果曾經想到過，那麼，就決不會趕不上公共汽車的。可是，現在他理直氣壯地回來了，做母親的安尼，却好像兒子是失而復得的，竟顯出這樣一種慌張失措的樣子……

“安尼！你……蓬頭散发的！……”

我不滿地大聲嚷着，離開了家瑋的小房子，也跟着重新跑下樓去。在這剎那間，我簡直有着一種要跟她爭吵一場的情緒。

二

吃了早點，家瑋很快就沉沉地睡着了。他自然是疲倦了。好在上午沒有課，就讓他好好地睡一覺吧。我在自己的臥室里耽擱了一會，就對安尼說了几句半諷刺的玩笑話，回到樓下的小書房里。

窗子外面，投着高大的白果樹的暗影，一片寂靜。自從發動除四害運動後，曾經有過一個時期，麻雀已經完全絕迹；不過究竟是在郊區，學校四周都是廣大的田野，鳥雀們活動的天地很開闊，不久就重新聽到了吱吱喳喳的聲音。

但这时，正当收获期，劫余的麻雀們大都飞到田間覓食去了。只从距离不远的运动場上，傳來飄忽的广播的声音——早操已經完毕，一个尖細的女音正在报告着什么。我躺在書桌旁边的藤椅上，点起一支紙烟，默默地吸着。在淡灰色的烟縷的繚繞里，我腦子里浮现起半年来的情景：

……时间是快的，眨眨眼，解放后已經八年了。八年来，我一直沒有离开过这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，把自己的天地划在原来那所狹窄得象鸽子籠一般的住屋里。今年的心境比較好，手头也比較寬裕，北京一家出版社还給我預支来一笔《中国农民革命史》的稿费，就决定趁春假的机会，到杭州去旅行一趟，訪問一下闊別已久的西子湖。我把这意思告訴安尼，得到了她非常热烈的贊同。于是，一方面由我向教职員組織的“春假杭州旅行团”报了名，参加的人数自然是全家三个，連費用也繳了；另一方面，由安尼給杭州的朋友写信，如果方便，到杭州后还准备和“旅行团”商量，單獨留在那里多玩它三五天。我还在箱子里找出一張解放前的“西湖全景”的彩色图，用紅鉛筆做上記号；安尼也忙着准备換洗的衣服，采买贈送朋友的禮品。总之，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出門旅行，这个决定，帶給安尼一种过节似的兴奋和喜悅，也喚起了我在青年时期酷愛旅行的全部热情……

可是，在临行的前夕，竟出了一个意外的問題——家瑋响应青年团的号召，要利用春假到附近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去参加义务劳动。

这情形，几乎把做母亲的人急哭了。

“你不知道爸爸已經報名到杭州去玩嗎？”她問他道，用一種簡直是哀求似的口吻。

“知道。”

“那你為什麼還要去參加義務勞動呢？”

“你跟爸爸一起去杭州，我就留在上海去幫農民除四害，收割麥子，這樣不是很好嗎？”

“可是報名是三個人呀，”安尼還想說服他，“再說，現在又不是農忙時期，你也從來沒有拿過鐮刀……”

“不會拿，農民不就是我的好老師！今年他們剛升成高級社，又是頭一回種雙季稻，要提前下谷種，加上除四害，掃除文盲，任務多，困難也比較大……”

看樣子，他倒要說服起他的母親來了。

“好吧，”我終於忍不住地從旁插嘴了，“我去把錢都退回來，大家都不用去杭州啦！”

不用說，我的態度有些不冷靜，也顯得有些突然，使得家瑋楞了一下。

“爸爸，你跟媽媽去吧，”他脹紅起一張臉孔，顯出一副遭冤受屈似的神情說道，“解放後，你們還沒有離開過上海一步，現在天氣好，不冷不熱的，玩西湖正是時候。不要為了我影響到你們的計劃。我實在不能去杭州玩。人家曹增慧也沒有跟曹伯伯一起去，也留下啦……”

“她也去農業社嗎？”安尼問。

“不，她跟別的同学去工廠，她說工廠里的工人正在趕做雙輪雙鐮犁。反正都一樣，都是去接近工农群眾！”

“你可不要誤会，”我切断他的話，“我決計沒有不贊成你去参加义务劳动的意思。我只覺得，既然你不能一起去，那就等以后再說吧；好在杭州离开上海很近，火車还不到四小时，机会总不会沒有的。”

就这样，一个美好的計劃成了泡影。

对家瑋說，那一次是一个起点。以后，几乎每一个礼拜天，他都要往那光明农业生产合作社里跑。从学校到农业社，有十八里路，因为那里剛好是公共汽車的終点，来往倒是很方便的。他在社里，已經交上了好几个朋友，还跟他們通信，給他們寄書报杂志。同时，在他的書架上，也就开始出現了一些象《怎样除棉虫》和《养蜂新法》之类的小册子。暑假里，类似春假的情形，几乎又发生了一次。假期开始前，教育工会決定組織一批老年教师到莫干山去避暑，我也受到了邀請。这一次，一开始，我就沒有把家瑋預計在內，我知道他不会放弃趁假期跑农村的机会。可是，安尼却还是为这件事情煩惱了好几天。她腦子里有个固执的念头，总觉得孩子从小就是帶在自己身边的，即使在解放前最困难的时候，也沒有分离过；現在，既然全家都去旅行避暑，怎能讓他一个人留在家里呢？再則，就算儿子長得比她自己还高，又已經是个大学生了，她这做母亲的人却还是把他当小孩子看待，每天晚上都要去給他盖一次被，稍微有一点伤风咳嗽，就会慌了手脚；在这样的炎夏天气里，她怎么也不能放心他去跑农村，晒太阳，去跟农民一样做苦活。为了說服孩子，她一連好几天跟他开談判，先說之以理，再动

之以情，甚至和他大声吵起嘴来。但結果，証明了孩子的决心是不可动搖的，还是只有作父母的人屈从了他的意志；只是由于我的坚持，才沒有打消去莫干山的計劃。

在山上的那些日子里，环境变换了，气候又非常凉爽，安尼的失眠症，却并没有得到痊愈，好象山野秀丽的景色，对她絲毫沒有发生作用。我知道这是为了什么。每隔兩三天，她就要給儿子写一封信，把自己一个母亲的关心和祝福寄給他。如果有兩三天沒有接到儿子的回信，她就会坐臥不安，一次一次地向服务員同志追查信件，甚至亲自跑下山脚去詢問邮局。也許，就是二十多年前我們的恋爱期間，当她还是一个热情的少女的时节，也沒有象現在对儿子这样热切地傾注过自己的深情厚爱吧？为了这，我不知道曾經嘲笑过她多少次。但她不仅完全不在意，有时我的嘲笑反而变成一瓢油，潑在她那母性的爱火上，更助長了它的熊熊烈焰。沒有办法，只好在假期未滿时，兩人就提前赶回上海来了。

一回学校，跨进住宅的門，安尼就用不可掩飾的微顫的声音，喊着儿子的名字。可是，她得到的，只是吳媽的一頓抱怨。家瑋沒有在家，他自然是到他的农业社里去了。据吳媽說，整个暑假，他簡直不大落屋，人也晒黑了，变瘦了，还曾經发过一回痧，高烧，嘔吐，把个吳媽急得什么似的，結果請校医来打了針才退烧止吐。“还叫我瞞着你們呢，”最后，吳媽又这样补充了一句，放下一樁重心事似的叹了一口气。

到了晚上，天已經黑將下來了，家瑋才回來。果然，人晒黑了，變瘦了，連頸子也顯細顯長了，額角上擠滿紫色的痱子，說起話來喉嚨是沙啞的，好象患着重感冒。

原來，他給他那社里捉了整個假期的棉蟲。

我自己，自從學生時代起，就被人稱為是一個賦有農民性格的人。其實，雖說我出身農村，在我的兄弟叔伯中間大都是農民，但我並沒有真正過過農民的生活，沒有經歷過農民的辛勞和貧困。我的祖父和父親，都是小地主，用現在的眼光看來，就是農民的寄生者和剝削者。在我的血管里，並沒有農民的血液。不過，究竟是接觸過農民，從小就呼吸過農村的空氣，也許在我的性格里，也多少沾有農民的固執吧，才得到了那样的稱呼。使我驚異的是，在家瑋身上，這種固執的性格，仿佛竟有了發展。我清楚地記得，還不曾下地學步，這孩子就表現出一種常言所說的“牛性子”——他想要得到什麼，就一定要得到它；他要做什么，就一定要做它。有時候，几樣心愛的小玩具，就能使他噘起一張小嘴，在自己的小床里專心一志地坐上半下午……

想到這一點，我從藤椅上站起身來，拋掉已經燒到手指的煙蒂。看看手表，已經八點半鐘了。我聽見安尼正從樓上下來。她輕輕地踩着樓梯，仿佛只要把腳放重一些，就會驚醒樓上小房子里熟睡的儿子。

三

二十多年前，當安尼還是音樂專科學校的学生的时候

候，她是一个神經質的任性的姑娘。她出身書香門第，父亲是很有名望的哲学教授，母亲是华侨的女儿。父母只生养她一个，用她自己的話說，她是在日丽风和的日子里，坐着黄金的船儿来到人間的，在跨出学校的大門前，不知道人間有貧穷和痛苦。我和她从恋爱到結婚，不知道看見她流过多少次眼泪——并不是为了遭受什么委屈，而是为了最初是对爱情的惊惶，接着是对爱情的陶醉，最后便是离开双亲的悲伤。在她的观念里，好象寄生的枝桠不能离开母体，一个女儿也永远不能离开母亲的怀抱。現在，我已經記不清婚后生活給予我的甜蜜和煩惱了；而且，那样的日子也很短促，因为很快就爆发了抗日战争。在抗战期間，我們，特别是安尼，可以說真正經受了生活的殘酷的考驗。从北到南，从东到西，簡直沒有在一个地方住上过一整年。警报的哀鳴，炸彈的轟响，長途汽車的顛簸，穷乡峻嶺中的奔走，还有小客棧里成群的臭虫和雷鳴似的蚊蚋，这些都已经习惯了；最使人感到辛酸难堪的，就是生活上完全失去了安全感。到了抗战后期，我总算已經踏上大学的講坛，得到了教授的头銜，安尼却变成一个蓬头垢臉的燒飯婆，每天早晨，提着个菜籃到菜場上去錙銖爭吵，回到宿舍里，就忙着洗衣作飯。她的臉色变苍白了，双手的皮肉变粗糙了；为了生不着火，她往往气得双眼流泪，渾身发抖。临到发薪水了，我拿着顆木头图章站到會計課的小窗口去，她就背着个布袋子，等在我后面，鈔票一接到手，就赶快往街上奔跑，只要落后一步，就会使有限的薪水再打个折扣。这样的生活，把

她过去那种少女的驕矜和玫瑰色的夢想，全部葬送和粉碎了，而且人也衰老得非常快，剛接近三十邊，頭上就出現了白发，眼角也就出現了皺紋……

我們是婚后不久就有了小孩子的。最初是一个男孩，接着又是一个女孩。抗战期間，安尼一共生了五胎。家瑋是第五胎。現在，我不願意再去回想那几个用乡下的話說來是“討債”的孩子，是在一种怎样的情况里夭折的。孩子弥留时的神色，盛着尸体的小小木棺入土时的惨象，对做父母的人，总是一种不愉快的記憶。不过，給了安尼最大的一个打击，却是大儿子家琛的失踪。

如果还活着，已經有二十五岁了，家琛比家瑋要大五足岁。常言說：“知子莫若父”，但我这个做父亲的人，却并不能了解儿子。临解放前不到四个月，还是一个中学生的家琛，突然失踪了。托人打听的結果，知道人給关在警备司令部里。應該坦白承認，当时，我对自己的估价是很可笑的。我竟拿着一張印有“某某大学历史学教授白曉天”的名片，亲自跑到警备司令部去請求保釋。完全出我意料，連儿子的面也沒有見到，自己却給看押了一禮拜，罪名是“叛党分子的家屬”。我还受了好几次的屈辱审讯，連家里也遭到一場匪劫式的搜查，失去了藏書的大半。如果不是跟教务長有同学的关系，私交還不錯，那一次就会給学校解聘，丟掉大学教授的头銜。其实，情形是很冤枉的，我不但完全不知道自己那个还不滿二十岁的儿子竟是什么“叛党”，而且，如果我知道了，我也会感到伤心的——我固然不願意自己的

儿子成为那些兩脚兽的官僚們的走卒，也并不希望他参加什么“叛党”。我从不过問政治上的党派斗争，有一个时期，我甚至不屑去看一眼那充满烟火气息的新聞报纸。我觉得，愈是在一个黑暗惡濁的世界里，我就愈应该保持自身的洁白；即使不能做到“不食周粟”，也要尽可能离开那腌臢的政治远一些。不論那个世代里，学問终究是能够受到尊重的——就算目前的情况不是这样，将来仍会給你一个公正的定評。可是，在远沒有得到这样的定評以前，我竟凭空变成了什么“叛党分子的家屬”！从警备司令部回到家里，头一件事情，就是把那一部化費十年心血写成的《南北朝史稿》投在火里：一則为了报复自己可笑的幻想；再則，这部稿子曾經給当作罪証搜去，随后又发回来的——它上面已經沾有那些兩脚兽的印迹。接着，我在病床上一連躺了好几个月，一直躺到解放。

可憐的自然还是安尼。从得到家琛失踪的消息那一刻起，她就陷进了一种半瘋狂的境地。說来好笑，儿子还不滿二十岁，她这做母亲的人，已經在給自己留心未来的媳婦。那是一个她表姊的女儿，年紀很輕就彈得一手好鋼琴，在学校里是一朵名花。我是懂得安尼的意思的：自己在音乐上的美夢已經破灭了，現在既然有着这样一个好姑娘，如果能由她这做母亲的人的努力，使那姑娘成为自己家屬中的一員，不仅对儿子說来是幸福，对她自己也可以算作美夢的寄托者。可是，正在这样的時候，家琛突然失踪了；接着，男人也給投到監獄里去了——这一切都来得这样猝不及防。素